

DOI:10.19361/j.er.2017.06.05

农业转移人口福利与 市民化倾向的理论构建和实证解释

齐红倩 席旭文 徐 曼*

摘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内在推动力源于收入和福利要素。本文在城镇化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二元经济特征的市民化理论模型,对市民化均衡水平的决定因素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并从市民化意愿出发,依据微观调查数据建立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改善均可以促进市民化均衡水平的提升,而农村拉力对市民化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的研究结论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诉求倾向”,即子女上学、政治参与以及职业培训状况的改善对市民化意愿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本文认为,以落户为核心的单一户籍制度改革并非推进市民化的关键,只有剥离和户籍绑定的各项福利政策,完善以满足新市民诉求为出发点的居住证制度、缩小福利歧视、渐进分类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福利,才能真正提升我国市民化的发展水平。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福利;可行能力

一、引言和文献述评

城镇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目标,即推动广大农业转移人口实现由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共享城市发展带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无法回避和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大量脱离土地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无法取得城市户口,不能平等地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游离于城市现代文明的边缘,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这一现状的长期存在不但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质量和农业转移人口福祉提升的主要障碍,更重要的是造成了诸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如何通过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破除城乡二元经济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成为当前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广泛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 齐红倩,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30012,电子信箱:qihongqian@126.com;席旭文,吉林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130012,电子信箱:everxiaowen@163.com;徐曼,吉林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130012,电子信箱:1620394317@qq.com。

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生产要素集聚与农民福利动态均衡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研究”(项目编号:14BJL063)、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常态下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要素配置与产业升级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6JJD7900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调整型经济增长对我国居民可持续性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3JJD790011)、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包含金融因素的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项目编号:2016144)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关于市民化问题的理论探究和实证分析已经十分丰富。围绕实现市民化的主、客观因素的讨论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动因出发,探讨市民化的动力和影响因素;二是测算全国或者部分地区的市民化发展水平以及农业转移人口面临的不平等程度。

从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动因来看,国外的经典文献和近期研究无论是强调城市工业化加速以及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Gollin et al., 2016),还是人力资本的积累(Lucas, 2004; He et al., 2016),其本质结论都是融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水平。正如Todaro(1969)指出,城市预期净收入高于农村地区是农业人口迁移的动因。然而,随着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现有文献对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动因动态变化这一重要事实的研究明显不足。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工作的高收入吸引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而随着城市经济和文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农业转移人口在注重城市高收入的同时,对城市发展带来的福利和精神文明的追求愈发强烈。因此,现阶段在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依旧明显和社会福利不平等的背景下,城市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收入方面,还更多地表现在其带来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以及现代文明氛围等方面。随着城镇化的深入,追求城镇地区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和更好的生活环境的动机正逐渐在农民工迁移决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宋锦、李实, 2014)。对此,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制度、家庭以及社会等非收入性因素对市民化的影响(刘传江、程建林, 2009; 何一鸣等, 2014; Henderson et al., 2017)。上述研究对市民化动因和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其关于迁移动因的解释不仅缺乏动态性的研究视角,也欠缺与现实密切关联的经验证据,另外,关于市民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也并未包含市民化内涵的多维要素群。因此,在城镇化和市民化动态发展的框架下,有必要进一步做深入的理论和实证探究。

从市民化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来看,国内学者围绕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对市民化程度测算和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市民化程度测算方面,魏后凯和苏红键(2013)测算得出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综合程度仅为39.6%,相关研究还有周密等(2012)以及刘传江和程建林(2008)等等。在不平等方面,Zhang和Bao(2015)以及Afridi等(2015)分别研究了中国区域不平等以及户口和城镇化的关系,高进云等(2007)、徐烽烽等(2010)、袁方和史清华(2013)、叶静怡和王琼(2014)等分别选取了不同的代表性指标对农业转移人口或者农户的福利水平进行了评价,论证了农地流转效应和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的不平等现状。尽管大量文献实证得出了全国或者部分地区的市民化水平,并指出了市民化过程中广泛存在于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居民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但是鲜有研究在可行能力的理论框架下,探讨市民化涉及的多维要素群尤其是福利要素对市民化的影响。进一步分析相关文献发现,阿玛蒂亚·森(Sen, 1992)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重新解释了福利的内涵,尽管其最初研究的焦点不限于市民化和人口迁移,但其广义福利所包含的要素与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动因涉及的各个方面高度契合。因此,本文将借鉴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框架展开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

本文依据经典城镇化理论并结合中国国情,引入衡量农业转移人口本质特征的福利诉求和成本约束要素,构建符合我国二元经济特征的市民化理论模型,在对各要素与市民化均衡水平关系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的基础上,从市民化意愿出发,依据微观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动因进行理论完善和补充,提出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动因是收

人和福利“动态交替”结果的观点,并且现阶段福利要素的作用尤为关键。第二,从包括收入、福利和成本的多维度研究视角出发,构建市民化水平决定的理论模型,并基于微观调研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丰富和完善现阶段对市民化过程的认知框架和体系。

二、包含收入、福利和成本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理论构建

本文在经典城镇化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动因进行拓展,基于此构建一个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模型,以此分析市民化水平(城镇化质量)的决定和均衡问题。本文模型建立的思路是:对 Todaro 提出的“城市预期净收入高于农村地区是农业人口迁移动因”的逻辑进行拓展,我们提出农业人口迁移的动因是城市预期净收益高于农村地区,其中“净收益”是指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之和与成本的差值,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代表迁移的“动力因素”,而成本代表迁移的“阻力因素”。因此,区别于传统理论模型,本文构建的模型重点强调农业转移人口福利水平和市民化成本在市民化水平决定中的关键作用。

(一) 基准模型

假定经济中存在农村和城市两个生产部门以及土地(L)、资本(K)和劳动力(N)三种生产要素,其中,农村部门使用土地和劳动力要素进行生产,城市部门使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进行生产,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①,而劳动力要素可以在两个部门之间自由流动^②。

农村部门生产函数为:

$$Y_R = A_R L^{1-\alpha_1} N_R^{\alpha_1} \quad (1)$$

城市部门生产函数为:

$$Y_U = A_U K^{1-\alpha_2} N_U^{\alpha_2} \quad (2)$$

(1)、(2)式中: Y_R 和 Y_U 分别为农村和城市部门总产出, A_R 和 A_U 分别为农村和城市部门生产技术水平, α_1 和 α_2 分别为农村和城市部门的劳动产出弹性, $0 < \alpha_1 < 1, 0 < \alpha_2 < 1$ 。 N_R 和 N_U 分别为农村和城市部门的劳动力水平, $N_R + N_U = N$ 。我们将总人口标准化为 1,那么 N_U 即代表市民化水平^③。进一步,遵循 Harris 和 Todaro(1970)的设定,本文将农村部门产品价格标准化为 1, p 为城市部门产品价格,即城市部门产品相对农村部门产品的价格,并假定两个部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各部门劳动力工资收入(ω_R 和 ω_U)等于其劳动力边际产品价值,结果如下:

$$\omega_R = \frac{\partial Y_R}{\partial N_R} = \alpha_1 \frac{Y_R}{N_R} = \alpha_1 \frac{Y_R}{1 - N_U} \quad (3)$$

$$\omega_U = p \frac{\partial Y_U}{\partial N_U} = p \alpha_2 \frac{Y_U}{N_U} \quad (4)$$

(二) 福利要素

区别于现有研究,本文强调现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动因更多体现在追求综合生活质量的提高,即综合福利水平的提升。因此,在模型构建中,我们加

①事实上,农村部门生产也需要部分资本要素,而城市部门生产也需要土地要素,但本文主要强调劳动力要素,其他要素视为既定不变,对生产要素和函数的假定并不影响最终结果。

②在 20 世纪,我国曾明确限制城乡人口流动,但是目前这一问题并不存在,城乡人口基本实现了自由流动。

③传统的模型中, N_U 代表城镇化水平,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我们在下文模型中将福利因素考虑在内,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设定。因此,在本文设定下,其代表市民化水平,即“高质量的城镇化”。

入了市民化的福利效应。本文主要借鉴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定义的广义福利水平,即通过评价功能性活动大小和自由程度来衡量福利状况。基于此,我们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福利至少应当包含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居住条件、就业机会、社会交往、政治参与和心理感受七个方面。为区分现有文献,本文将收入水平分离出来进行单独考察,因此本文所指的福利均为除收入外的其他方面之和。限于篇幅,关于可行能力的福利理论可以参考袁方和史清华(2013),本文不再赘述。

对于农村部门而言,农业劳动人口所享受到的福利较为有限,主要包括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地区的子女入学等等,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其他社会保险和住房方面几乎不享有任何保障。鉴于此,本文假定农村部门福利水平为相对稳定的常量,这一假定并非模型的核心部分,也并不影响全文的主要结论。对于城市部门福利水平的假定则较为复杂,一方面,已取得城市户籍的城市人口和少数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市地区的全部福利和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在我国现行的制度下,未能取得城市户籍的农业转移人口或享有少数的城市福利^①,或不享有任何的城市福利。在此背景下,构建统一的城市福利函数较为困难。本文认为,影响城市部门人口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福利水平的核心因素是制度和城镇化程度。从制度来看,正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和与之绑定的福利制度导致了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无法获得与市民同样的福利水平,因此,包含户籍和福利等在内的制度是决定城市部门福利水平最为关键的因素。而从城镇化发展水平来看,其发展水平越高,即农业转移人口数量越多,在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有限供给的前提下,人均福利水平必然下降,即出现了所谓的城市“拥挤效应”。因此,在本文的福利模型设定中,假定城市福利水平和制度开放程度正相关,和市民化(城镇化)负相关^②。这样,我们就将模型的核心变量市民化水平(N_U)内生于福利函数之中。

在上述设定下,农村和城市部门的福利函数表示如下:

$$\pi_R = \bar{\pi} \quad (5)$$

$$\pi_U = \pi(S, N_U) = \tau \varphi \frac{S}{N_U}, \varphi > 0, 0 < \tau < 1 \quad (6)$$

(5)、(6)式中: π_R 和 π_U 分别表示农村和城市部门典型个体的平均福利水平; S 表示制度开放程度,用以衡量户籍和福利制度对农业转移人口获得福利的限制程度, S 越高,其限制程度越低,进而城市部门平均福利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φ 表示换算系数,用以实现 S 和 N_U 比率与福利水平之间的换算; τ 表示调整系数,用以对城市部门平均福利水平进行调整。

对于福利效应的假定,还有如下三点需要说明:第一,福利本身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而无法精确界定,通过参数化的形式构建城市部门福利函数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现有文献对于福利的量化处理主要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高进云等,2007;Decancq and Lugo,2013)。然而,本文理论部分研究的重点并非全面描述福利的构成^③,而是强调福利在市民化过程中的

①从现实情况来看,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比如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保,可以享有诸如“五险一金”和子女入学等方面的福利。

②当然,也不排除随着市民化水平的提高,城市福利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大幅提升。但是,从现阶段我国国情来看,这一供给水平仍然较低,即使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存在人口承载压力,“拥挤”现象十分严重。

③在本文的实证部分,我们将全面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福利的构成,并使用其代理变量建立计量模型。

关键作用及其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模糊的处理方法在均衡分析中也无法求得解析解。因此,我们采取简单的参数化方式构建模型,做探索性的尝试。第二,要将福利、收入水平和成本共同纳入模型,就需要三者具有可比性,即计量单位一致。对此,在经济意义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本文通过换算系数 φ 实现三者单位的统一,即本文假定福利水平是货币化的福利水平,进而实现了三者的可比性和建模的可行性。第三,就一般意义而言, N_U 并非代表市民化水平,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为了突出本文的研究目标,我们在福利方程中加入调整系数 τ 。即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部门具有如下的特殊性:在收入方面,其参与城市部门的生产,因而可以获得城市竞争性的工资报酬;而在福利方面,其并没有享受全部的城市福利,因而这一部分群体的福利水平较城市市民会有所损失,我们用 τ 对其调整。在这一假定条件下, N_U 的均衡水平代表考虑了福利调整的城镇化水平,亦即代表了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市民化水平,这也是本文研究市民化问题的一个创新。

(三) 成本要素

以上两个部分分析的收入效应和福利效应代表了农村和城市部门居民的正向收益,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动力因素”。而与此相伴的成本效应亦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其成本效应,即农村部门居民的生活成本、城市居民和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成本以及农业转移人口的迁移成本。其中,虽然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一定程度受到交通成本、制度壁垒造成的寻租成本等迁移成本的影响,但是,鉴于当前我国交通条件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农业转移人口从农村到城市迁移的交通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此同时,制度壁垒因素已经包含在福利效应的部分。因此,本文将不考虑迁移成本,而重点考察农村和城市居民以及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成本,这一成本即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阻力因素”。

本文假定农村生活成本处于较低的稳定水平,我们将其设定为:

$$C_R = \bar{C} \quad (7)$$

根据现有研究,农业人口转移带来的集聚效应是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直接推动力 (Lucas, 2004; An and Henderson, 2006), 因此,在农业转移人口城市生活成本效应的设定方面,应当重点考察集聚效应。关于集聚效应和生活成本的量化关系问题,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结论,本文将借鉴 Davis 和 Henderson (2003) 以及王曦和陈中飞 (2015) 的研究思路和处理方法,将城市部门的生活成本设定为:

$$C_U = C(A_U) \quad (8)$$

(8)式中: C_U 代表城市部门的生活成本, A_U 代表城市部门的生产技术水平, $C'(A_U) > 0$, $C''(A_U) < 0$ 。该设定意味着城市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城市生活成本越高,即城市发达程度和生活成本呈正相关关系。

(四) 均衡分析

由上文分析可知,城市部门预期净收益高于农村部门是农业人口转移的动因,由此得出市民化模型均衡的条件为农村部门净收益等于城市部门净收益:

$$\omega_R + \pi_R - C_R = \omega_U + \pi_U - C_U \quad (9)$$

在这一均衡条件的基础之上,我们求得市民化均衡水平的解析解,并在均衡点处展开比较静态分析,得出影响市民化均衡水平的关键因素。将式(3)-(8)代入式(9)可得:

$$\alpha_1 \frac{Y_R}{1-N_U} + \bar{\pi} - \bar{C} = p\alpha_2 \frac{Y_U}{N_U} + \tau\varphi \frac{S}{N_U} - C(A_U) \quad (10)$$

整理得:

$$-(\bar{\pi} + C(A_U) - \bar{C})N_U^2 + (\alpha_1 Y_R + \bar{\pi} + C(A_U) - \bar{C} + p\alpha_2 Y_U + \tau\varphi S)N_U - p\alpha_2 Y_U - \tau\varphi S = 0 \quad (11)$$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令: $a = \bar{\pi} - \bar{C} + C(A_U)$, $b = p\alpha_2 Y_U + \tau\varphi S$, 易知 $a > 0, b > 0$ 。其中, a 由农村福利水平减去农村生活成本的差值与城市生活成本之和构成,代表了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阻力因素”, b 由城市产出和城市福利两个部分构成,即代表了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两大“动力因素”。式(11)可以进一步简写为:

$$-aN_U^2 + (\alpha_1 Y_R + a + b)N_U - b = 0 \quad (12)$$

可以看出,式(12)是关于市民化水平的一元二次方程,在进一步求解前,我们首先考察其根的判别式: $\Delta = (\alpha_1 Y_R + a + b)^2 - 4ab > (a + b)^2 - 4ab = (a - b)^2 \geq 0$,可知方程存在实根,保证了模型均衡解的存在性,我们求出如下的解^①:

$$(N_U^*)_1 = \frac{-(\alpha_1 Y_R + a + b) + \sqrt{\Delta}}{-2a}, (N_U^*)_2 = \frac{(\alpha_1 Y_R + a + b) + \sqrt{\Delta}}{2a}$$

容易证明, $0 < (N_U^*)_1 < (N_U^*)_2$,即存在两个市民化水平的均衡解,这一结论与经典的城镇化发展“S型理论”相符。从世界各国的城镇化发展现状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后期,平均城镇化水平高达80%以上,而我国当前城镇化率已达到57%,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城镇化(市民化)发展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均衡路径收敛,因此,我们主要运用均衡解 $(N_U^*)_2$ 展开比较静态分析。

(五) 比较静态分析和基本假设

在比较静态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证明“阻力因素” a 和“动力因素” b 对市民化均衡水平的影响方向。由附录证明可知: $\frac{\partial (N_U^*)_2}{\partial a} < 0, \frac{\partial (N_U^*)_2}{\partial b} > 0$ 。

结果和我们的直观结论以及市民化发展的现实情况一致。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城市部门收入水平、调整系数、制度开放程度、农村部门福利水平等因素对市民化均衡水平的影响,并据此提出基本假设。本文主要从影响市民化均衡水平的城市收入水平、城市和农村福利水平两个部分的重要参数和变量展开比较静态分析。其中,在收入部分,我们直接分析城市部门产出(收入)水平对市民化的影响;在福利部分,将通过调整系数、制度开放程度和农村部门福利水平等重要参数和变量进行分析。

从收入方面来看: $(N_U^*)_2$ 对 $p\alpha_2 Y_U$ 求导可得式(13),表明城市收入(产出)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市民化均衡水平的提高,即在城镇化发展的初始阶段城乡收入差距是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和市民化的主要动力,这与 Todaro(1969)以及 Harris 和 Todaro(1970)经典模型的结论一致。而随着城镇化和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和市民化的主要动力将

^①事实上,本文求得的均衡解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均衡解,因为其中涉及到的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的产出与市民化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内生性,最好的办法是将均衡解用所有的外生变量表示,但是这一过程十分繁杂,不易实现。对于本文的研究目标和比较静态分析而言,这一均衡解已经可以从定性的角度达到研究目的。

逐渐由收入要素转变为福利要素。因此,我们得出基本假设 1。

假设 1:城市收入水平提高有助于市民化水平的提升。

$$\frac{\partial(N_U^*)_2}{\partial(p\alpha_2 Y_U)} = \frac{\partial(N_U^*)_2}{\partial b} \cdot \frac{\partial b}{\partial(p\alpha_2 Y_U)} > 0 \quad (13)$$

从福利方面来看: $(N_U^*)_2$ 分别对调整系数 τ 和制度开放程度 S 求偏导可得式(14)和(15)。一方面,调整系数的提高表明尚未取得城市户籍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的福利水平和城市发展红利更加接近城市居民,有助于市民化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制度开放程度越高,户籍、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就业等制度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限制和歧视将越小,也可以有效提高市民化水平。总之,城市福利水平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福利水平的提升对于市民化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由此,我们得出基本假设 2。

假设 2:城市福利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市民化水平的提升。

$$\frac{\partial(N_U^*)_2}{\partial \tau} = \frac{\partial(N_U^*)_2}{\partial b} \cdot \frac{\partial b}{\partial \tau} > 0 \quad (14)$$

$$\frac{\partial(N_U^*)_2}{\partial S} = \frac{\partial(N_U^*)_2}{\partial b} \cdot \frac{\partial b}{\partial S} > 0 \quad (15)$$

我们进一步考虑农村部门福利水平对市民化的影响: $(N_U^*)_2$ 对 π 求偏导可得式(16),表明农村部门福利水平的提升将不利于市民化水平的提升。这一推论看起来有悖常理,因为从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农村部门福利水平提升可以提高农村的收益,进而促进现代化农村的建设。但是,这一结论却是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的。在当前我国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时期,较为丰厚的农业补贴和其他惠农政策一定程度提高了农民的福利水平,阻碍了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形成了不利于市民化(城镇化)的“农村拉力”。因此,我们提出基本假设 3。

假设 3:农村福利水平的提升不利于市民化水平的提升。

$$\frac{\partial(N_U^*)_2}{\partial \pi} = \frac{\partial(N_U^*)_2}{\partial a} \cdot \frac{\partial a}{\partial \pi} < 0 \quad (16)$$

三、实证数据、变量和模型设定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由作者所在单位组成的“农业转移人口福利和市民化”课题组调查所得,课题组于 2015 年 3 月至 9 月对东北三省、河北省、河南省、安徽省、福建省和四川省的 10 个城市进行了调查,抽样过程遵循三阶段分层抽样方法。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地域选取不同的省份,涵盖了东北、华北、中部、东南和西南地区;其次,选择每一个省份农业转移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主要以省会城市为主,具体包括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大连、石家庄、郑州、合肥、福州和成都;最后,在每一个城市,课题组分别选取了其中典型的商业区、劳工市场、工厂以及建筑工地等区域,对不同行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行了访谈调研,每个行业的占比遵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行业构成。课题组共发放和回收问卷 1 000 份(每个城市 1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975 份。问卷调查完成后,课题组对原始数据的每一个变量都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对于有效问卷中明显不合理的个别取值,我们根据其他变量取值对其进行了缺失值处理,保证了数据的可信度。具体样本的行业分布见表 1。可以看出,农业转移人口主要分布

于建筑业和制造业,二者比重高达 56.3%,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总体的行业分布相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 年农民工监察报告》中建筑业和制造业农民工比重为 56.6%。此外,餐饮服务业占比为 15.9%,而其他行业占比均低于 10%。

表 1 样本的行业分布

行业	服装销售	家政服务	装修行业	维修服务	其他行业	餐饮服务	制造业	建筑行业	总计
样本量	39	43	46	56	87	155	199	350	975
占比(%)	4.0	4.4	4.7	5.8	8.9	15.9	20.4	35.9	100

(二) 变量设定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选择,解释变量涵盖了市民化影响因素中的收入变量、福利变量以及农村拉力变量,同时选取代表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特征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表述、赋值和简单描述性统计见表 2^①。其中,在收入部分,本文同时考虑了短期收入和长期收入。短期收入水平比较直观,即农业转移人口的当期月均和年均收入水平,鉴于农业转移人口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间歇性(如建筑业工人冬季不开工),本文选取年均收入;长期收入水平的衡量则存在较大难度,本文主要考虑了农业转移人口工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对于这一群体而言,劳动合同的签订在一定程度可以保证其收入的持久性。在福利部分,参考国内学者对可行能力的扩展和变量设定(高进云等,2007;尹奇等,2010;袁方、史清华,2013;叶静怡、王琼,2014),本文考虑了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可行能力的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机会、社会交往、政治参与和心理感受六大方面的因素。在农村拉力方面,本文重点考察了土地的自愿流转情况。此外,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表征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特征的婚姻状况、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籍贯、在城市工作时间以及从事行业等控制变量。

表 2 变量表述、赋值和简单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赋值	均值 (占比)
被解释变量	市民化选择	<i>citizenization</i>	1=返回农村;2=不确定;3=继续留在城市	2.1190
收入变量	年均收入	<i>income</i>	1=2 万元以下;2=2-3.9 万元;3=4-5.9 万元;4=6-7.9 万元;5=8-9.9 万元;6=10 万元以上	3.2974
	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i>contract</i>	1=没有签订劳动合同;2=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3=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	1.7651
福利变量	购买社会保险种类	<i>insurance</i>	0=没有;1=1 类;2=2 类;3=3 类;4=4 类;5=5 类	2.1385
	在城市居住情况	<i>house</i>	1=无固定居住地;2=租房 1 年以下;3=租房 1-2 年;4=租房 3 年以上;5=拥有产权住房	2.5005
	子女在城市上学情况	<i>study</i>	1=没有子女、子女辍学或不在城市;2=入读民办(私立)学校;3=入读公办学校	1.9887
	城市政治参与情况	<i>political</i>	0=未参加政治活动;1=参加过 1 类活动;2=参加过 2 类活动;3=参加过 3 类活动	0.8533
	城市归属感	<i>belong</i>	1=毫无归属感;2=较弱;3=一般;4=较强;5=非常强	3.5538
	拥有城市朋友数量	<i>friend</i>	0=无;1=1-3 个;2=4-5 个;3=6-10 个;4=10 个以上	2.0513
	是否参加职业培训	<i>train</i>	0=否;1=是	0.6236

①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给出了变量的均值,如有需要,其他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

续表 2 变量表述、赋值和简单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赋值	均值 (占比)
农村拉力	农村土地种植情况	<i>landuse</i>	1=5 亩以下;2=5-9.9 亩;3=10-20 亩;4=20 亩以上	1.7846
	土地自愿流转情况	<i>landtransfer</i>	1=转出但没有转入;2=没有转入和转出;3=转入并且转出;4=转入但没有转出	2.4113
	是否享有惠农政策	<i>landpolicy</i>	0=没有;1=有	0.7569
个体特征	婚姻状况	<i>marry</i>	0=未婚或离异;1=已婚	0.4985
	年龄	<i>age</i>		30.4318
	性别	<i>gender</i>	0=女性;1=男性	0.7159
	文化程度	<i>education</i>	1=没上过学;2=小学;3=初中;4=高中或中专;5=大专;6=本科及以上	3.6862
	籍贯	<i>province</i>	0=外省;1=本省	0.6605
	在城市工作时间	<i>worktime</i>	1=6 个月以下;2=6 个月-1 年;3=1-2 年;4=2-5 年;5=5 年以上	3.4626
	从事行业	<i>industry</i>		
检验变量	是否愿意转为城镇户口	<i>hukou</i>	0=否;1=是	0.5877

注:(1)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五种类型;(2)政治参与情况中的类别包括社区管理(活动)、党(团)组织活动和选举;(3)惠农政策包括土地种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和种子购买补贴等;(4)在城市工作时间为1年和2年时,变量分别取2和3;(5)拥有城市朋友数量指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务工城市交往的具有当地城市户口的朋友数量;(6)检验变量用于进行稳健性检验,不进入基准回归模型;(7)在本表最后一列中,定序变量为均值,二值变量为占比。

(三) 实证模型

由于本文使用的被解释变量并非连续变量或者二值变量,因而传统的 OLS、Logit 和 Probit 回归模型并不适用。鉴于此,本文采用有序 Probit(Ordered Probit) 回归模型,该模型可以通过对变量真实取值临界点的估计处理定序被解释变量,关于模型的具体表述和估计方法参见 Wooldridge(2002)。本文使用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 \Pr(\text{citizenization}_{ij}=s) = & \beta_0 + \beta_1 \text{income}_{ij} + \beta_2 \text{contract}_{ij} + \beta_3 \text{insurance}_{ij} + \beta_4 \text{house}_{ij} + \beta_5 \text{study}_{ij} + \\ & \beta_6 \text{political}_{ij} + \beta_7 \text{belong}_{ij} + \beta_8 \text{friend}_{ij} + \beta_9 \text{train}_{ij} + \beta_{10} \text{landuse}_{ij} + \\ & \beta_{11} \text{landtransfer}_{ij} + \beta_{12} \text{landpolicy}_{ij} + \beta' X_{ij} + \delta D_j + \varepsilon_{ij} \end{aligned} \quad (17)$$

(17)式中:*i*代表个体,*j*代表行业,*s*表示市民化所处的不同状态,取值为1-3,*X_{ij}*是由表征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所组成的向量,*β'*为其对应的系数向量,*D_j*代表行业虚拟变量,*ε_{ij}*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

本部分实证结果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有序 Probit 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了各个解释变量对市民化的影响方向;二是基于回归结果计算的边际概率影响,可以精确表示每一个解释变量的边际变动对市民化的影响;三是关于异方差、内生性和稳健性问题的讨论。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3模型(1)为式(17)的回归结果,模型(2)进一步剔除了模型(1)中不显著的变量进行回归,模型(3)为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将在下文进行讨论。从基准回归结果来看,收入变量、核心福利变量以及土地自愿流转变量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通过回归结果中的影响方向我们可以初步得出,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均可以强化市民化意愿,表明农业转移人口

迁移动因不仅仅是城市的高收入,还包括各方面的福利,即可行能力的提升才是农业转移人口迁移的最终动因,由此,第二部分提出的基本假设 1 和假设 2 得证。土地的自愿转入可以明显降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即农村拉力切实存在并且是影响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因此,可以从土地的角度论证假设 3 的合理性^①。

表 3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i>income</i>	0.1520 *** (0.0570)	0.1510 *** (0.0565)	0.1282 ** (0.0580)
<i>contract</i>	0.3994 *** (0.0722)	0.3909 *** (0.0721)	0.2197 *** (0.0783)
<i>insurance</i>	0.3408 *** (0.0443)	0.3385 *** (0.0429)	0.1087 ** (0.0423)
<i>house</i>	0.1065 ** (0.0500)	0.1151 ** (0.0490)	0.1933 *** (0.0627)
<i>study</i>	0.5869 *** (0.0789)	0.5810 *** (0.0770)	0.2764 *** (0.0804)
<i>political</i>	0.4867 *** (0.0963)	0.4800 *** (0.0934)	0.1724 ** (0.0787)
<i>belong</i>	0.2232 *** (0.0509)	0.2345 *** (0.0502)	0.1317 ** (0.0555)
<i>friend</i>	0.0605 * (0.0363)	0.0575 (0.0359)	0.4885 *** (0.0477)
<i>train</i>	1.5263 *** (0.1297)	1.5462 *** (0.1255)	0.7980 *** (0.1374)
<i>landuse</i>	-0.0306 (0.0538)		-0.1046 * (0.0617)
<i>landtransfer</i>	-0.3669 *** (0.0584)	-0.3680 *** (0.0585)	-0.1510 *** (0.0584)
<i>landpolicy</i>	0.0370 (0.1150)		-0.0529 (0.1332)
<i>marry</i>	-0.3198 ** (0.1303)	-0.3349 *** (0.1288)	0.0085 (0.1442)
<i>age</i>	-0.0144 * (0.0082)	-0.0139 * (0.0079)	-0.0207 ** (0.0082)
<i>gender</i>	0.0549 (0.1231)		0.1015 (0.1315)
<i>education</i>	0.0252 (0.0474)		-0.0510 (0.0503)
<i>province</i>	0.1970 (0.1216)		0.0336 (0.1358)
<i>worktime</i>	-0.0295 (0.0425)		-0.2035 *** (0.0470)
<i>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临界点 1	1.5983 *** (0.4256)	1.5357 *** (0.3642)	
临界点 2	5.4867 *** (0.4724)	5.4085 *** (0.4118)	
Pseudo R^2	0.5933	0.5915	0.5039
样本量	975	975	975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回归结果中的标准差(括号内数值)均使用稳健标准误,下同。

^①尽管土地种植面积和惠农政策不显著,从土地自愿流转这一变量也可以看出农村拉力对市民化的影响,同时农村福利相对较少且难以衡量,我们将土地视为农村福利(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 边际概率影响

基准回归模型的系数仅可以反映解释变量对市民化的影响方向,并不能精确表示其边际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计算其边际概率影响,即解释变量的边际变动对市民化意愿进入某一状态的概率影响。在边际影响的计算结果中,如果考察从其他状态进入某一特定状态的概率变动,系数为正说明解释变量的正向边际变动可以提升进入该状态的概率,系数为负则表示降低了进入该状态的概率。本文被解释变量具有三种状态,但进入状态 2 既可以从状态 3 进入,也可以是从状态 1 进入,因而对其进入概率的考察并不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因此,本文重点考察进入状态 3 和状态 1 的概率变动,其中,进入状态 3(市民化意愿最强)的概率变动我们称之为概率改善,进入状态 1(市民化意愿最弱)的概率变动我们称之为概率恶化,并且仅针对模型(1)中显著的变量进行计算。

根据预测结果(见表 4),收入水平每提升一个等级,将促进市民化概率改善 2.04%,抑制市民化概率恶化 0.33%;劳动合同签订状况每改善一个等级,将促进市民化概率改善 5.35%,抑制市民化概率恶化 0.87%;购买保险种类、在城市居住情况、子女上学情况、政治参与、城市归属感以及城市朋友数量的正向边际变动,将分别促进市民化概率改善 4.57%、1.43%、7.86%、6.52%、2.99%和 0.81%,抑制市民化概率恶化 0.74%、0.23%、1.28%、1.06%、0.49%和 0.13%;相对于未接受职业培训的农业转移人口,接受职业培训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概率改善将明显提升 17.58%,市民化概率恶化将明显降低 7.08%;农地自愿流转(转入)情况每提升一个等级,将抑制市民化概率改善 4.92%,促进市民化概率恶化 0.80%。可以看出,农业转移人口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均可以明显提升市民化概率改善程度,抑制市民化概率恶化程度,并且呈现出如下特点:子女上学情况、政治参与以及职业培训等福利变量对概率改善的提升作用和概率恶化的抑制作用大于收入变量。

表 4 边际概率影响计算结果

解释变量		市民化概率改善	市民化概率恶化
收入变量	<i>income</i>	0.0204 ** (0.0081)	-0.0033 ** (0.0015)
	<i>contract</i>	0.0535 *** (0.0103)	-0.0087 *** (0.0024)
福利变量	<i>insurance</i>	0.0457 *** (0.0071)	-0.0074 *** (0.0019)
	<i>house</i>	0.0143 ** (0.0069)	-0.0023 * (0.0012)
	<i>study</i>	0.0786 *** (0.0130)	-0.0128 *** (0.0035)
	<i>political</i>	0.0652 *** (0.0141)	-0.0106 *** (0.0032)
	<i>belong</i>	0.0299 *** (0.0075)	-0.0049 *** (0.0017)
	<i>friend</i>	0.0081 * (0.0049)	-0.0013 (0.0009)
	<i>train</i>	0.1758 *** (0.0197)	-0.0708 *** (0.0164)
农村拉力	<i>landtransfer</i>	-0.0492 *** (0.0092)	0.0080 *** (0.0023)
个体特征	<i>marry</i>	-0.0430 ** (0.0182)	0.0071 ** (0.0034)
	<i>age</i>	-0.0019 * (0.0011)	0.0003 * (0.0002)

(三) 异方差、内生性和稳健性讨论

由于本文使用数据为截面数据,因而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统计检验失效,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均采用了稳健标准误,并且使用控制变量消除了个体和行业异质性。同时,内生性也是几乎所有回归模型均可能面临的关键问题,导致内生性的原因主要有模型设定偏误(遗漏变量)、样本选择偏差和双向因果关系等。从本文的实证模型来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解释变量包含了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收入、福利和农村拉力变量,并且加入了表征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了行业异质性,因而存在模型设定偏误的可能性较小;同时,本文选取分布在多个地区、各个行业的农业转移人口作为研究样本,抽样具有随机性,而被解释变量也不存在有限取值问题,因而不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另外,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市民化主观意愿,而且是离散的定序变量,并非连续的客观统计数据,因此也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问题。本文对基准回归模型的稳健性进行了如下检验:由于在现行制度下,城市户口仍然是市民化的主要标志,因而在问卷设定中,我们设计了和被解释变量同质的“是否愿意转为城镇户口”变量,用其替代基准模型中的市民化变量进行 Probit 回归,既可以验证模型的稳健性,还可以进一步判断问卷数据的真实性。表 3 的模型(3)中列出了 Probit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模型基本保持一致,所有的核心解释变量均至少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论性评述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实现高水平、高质量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市民化发展相对滞后一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那么,市民化过程内涵哪些要素?何种原因导致了中国市民化发展滞后?本文从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动因入手,重点从福利的角度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

本文在市民化理论构建部分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内在推动力源于收入和福利两大要素。事实上,围绕收入和福利要素,可以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市民化的初始阶段,即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初期,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逐步消除,受城市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和城市工作高收入水平的吸引,大批农业转移人口脱离农村土地进入城市务工,因此,这一阶段收入因素是农业转移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第二阶段是市民化的成熟阶段,即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诉求不再仅仅局限于高收入,而是更加注重包含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融入感和获得感等在内的广义福利水平的提升,同时各类惠农政策的出台也一定程度影响其市民化决策。因此,这一阶段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决策受城市收入、福利和农村拉力的共同影响,其中福利因素及所带来的生活满意度更为关键。本文通过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很好地印证了上述推论,即收入、福利水平的提升均可以促进市民化均衡水平的提升,农村拉力对市民化水平的提升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诉求倾向”,即子女上学、政治参与以及职业培训等福利变量的市民化效应更加明显。

市民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本文的工作为今后市民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基准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证借鉴。基于研究结果和对中国国情的思考,本文得出如下的政策启示:

(1)提升市民化水平的关键并非以落户为核心的单一户籍制度改革,而应该剥离和户籍绑定的各项福利政策,完善以满足新市民需求为出发点的居住证制度,渐进分类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福利。(2)从福利因素包含的多个维度来看,对于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倾向而言,提升其职业培训水平比单纯增加受教育年限更为有效,满足其子女入学和政治参与的诉求也尤为重要。(3)应继续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维护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增强其自主选择权,弱化农村拉力对其市民化倾向的抑制作用。

附录:

$$\begin{aligned}\frac{\partial(N_U^*)_2}{\partial a} &= -\frac{1}{2a^2}(\alpha_1 Y_R + b) - \frac{1}{2a^2\sqrt{\Delta}} + \frac{1}{2a\sqrt{\Delta}}(\alpha_1 Y_R + a - b) = -\frac{1}{2a^2\sqrt{\Delta}}[(\alpha_1 Y_R + b)\sqrt{\Delta} + \Delta - a(\alpha_1 Y_R + a - b)] \\ &= -\frac{1}{2a^2\sqrt{\Delta}}[\alpha_1 Y_R \sqrt{\Delta} + b\sqrt{(\alpha_1 Y_R + a + b)^2 - 4ab} + (\alpha_1 Y_R + a + b)^2 - 4ab - a(\alpha_1 Y_R + a - b)] \\ &< -\frac{1}{2a^2\sqrt{\Delta}}[\alpha_1 Y_R \sqrt{\Delta} + b|a - b| + b(b - a) + (\alpha_1 Y_R)^2 + a\alpha_1 Y_R + 2b\alpha_1 Y_R]\end{aligned}$$

由于 $b|a - b| + b(b - a) \geq 0$, 故 $\frac{\partial(N_U^*)_2}{\partial a} < 0$ 。

$$\frac{\partial(N_U^*)_2}{\partial b} = \frac{1}{2a}\left[1 + \frac{1}{\sqrt{\Delta}}(\alpha_1 Y_R + b - a)\right] = \frac{1}{2a\sqrt{\Delta}}(\sqrt{(\alpha_1 Y_R + a + b)^2 - 4ab} + \alpha_1 Y_R + b - a) > \frac{1}{2a\sqrt{\Delta}}(|a - b| + (b - a) + \alpha_1 Y_R) > 0$$

参考文献:

- 高进云、乔荣锋、张安录,2007:《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管理世界》第6期。
- 何一鸣、罗必良、高少慧,2014:《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基于制度供求视角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第5期。
- 刘传江、程建林,2008:《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人口研究》第5期。
- 刘传江、程建林,2009:《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经济学家》第10期。
- 宋锦、李实,2014:《农民工子女随迁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 王曦、陈中飞,2015:《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决定因素:基于国际经验》,《世界经济》第6期。
- 魏后凯、苏红键,2013:《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徐烽烽、李放、唐焱,2010:《苏南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前后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 叶静怡、王琼,2014:《进城务工人员福利水平的一个评价——基于 Sen 的可行能力理论》,《经济学(季刊)》第4期。
- 尹奇、马璐璐、王庆日,2010:《基于森的功能和能力福利理论的失地农民福利水平评价》,《中国土地科学》第7期。
- 袁方、史清华,2013:《不平等之再检验:可行能力和收入不平等与农民工福利》,《管理世界》第10期。
- 周密、张广胜、黄利,201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农业技术经济》第1期。
- An, C.C., and J.V.Henderson.2006.“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3(3): 549-576.
- Afridi, F., S.X.Li, and Y.Ren 2015.“Social Identity and Inequality: The Impact of China's Hukou Syste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23(3): 17-29.
- Davis, J.C., and J.V.Henderson.2003.“Evidenc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Journal*

- of *Urban Economics* 53(1):98–125.
16. Decancq, K., and M. A. Lugo. 2013. “Weights in Multidimensional Indices of Wellbeing: An Overview.” *Econometric Reviews* 32(1):7–34.
17. Gollin, D., R. Jedwab, and D. Vollrath. 2016. “Urbanization with and without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1(1):35–70.
18. He, Canfei, Tianming Chen, Xiyan Mao, and Yi Zhou. 2016. “Economic Transition,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in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51(3):39–47.
19. Harris, J.R., and M.P. Todaro. 1970.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1):126–142.
20. Henderson, J.V., A. Storeygard, and U. Deichmann. 2017. “Has Climate Change Driven Urbanization in Afric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4(3):60–82.
21. Lucas, Jr R.E. 2004. “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S1):29–59.
22. Sen, A. 1992. *Inequality Reexamin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3. Todaro, M.P.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138–148.
24. Wooldridge, J. 2002.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5. Zhang, W., and S. Bao. 2015. “Created Unequal: China’s Regional Pay Inequal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ega-trend Urbanization.” *Applied Geography* 61(7):81–93.

Welfare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and Civilizat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Qi Hongqian¹, Xi Xuwen² and Xu Man²

(1: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2: School of Business,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civilization process comes from income and welfare.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urbanization, we constructed the civilization theoretical model accords with the practice of dual economy in China, analyzed the determinants of civilization equilibrium level with comparative static analysis, and considered the civilization subjective wishes of migrants, through a micro empirical study, proved the correctness of theoretical hypothe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income and welfare level will promote civilization, rural pull has inhibiting effect.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transferring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 civilization process have obvious “demand tendency”, the improvement of children educ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vocational training will mostly promote civilization process. We hold that: the single household register system reform is not the key to promote civilization, only by separating welfare policy from census register, steadily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residence system, gradually improving welfare of migrants and reducing welfare discrimination, can enhance the standard of China’s civilization.

Keywords: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Civilization, Welfare, Capability

JEL Classification: R10, R11, D63

(责任编辑: 陈永清)